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编

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刘登翰选集

刘登翰 著

China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Literatures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编

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刘登翰选集

刘登翰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 刘登翰选集 / 刘登翰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2. 10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第1辑)
ISBN 978-7-5360-6608-3

I. ①华… II. ①刘… III. ①华文文学—文学研究—
世界—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9843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 谓 李加联 杜小烨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1.875
字 数 350,000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自序

收入本书的二十篇文章，选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的一些相关著作。

我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入华文文学这一研究领域的。1980 年初，我在疏离文学近二十年之后，重新回到文学研究岗位。乍一回来，我仿如昨日刚刚踏出校门的大学生（甚至还不如），全部的知识储备就是大学所学、又已大部分忘了的那一点点东西。对于面临的学术工作，生疏而茫然，不仅不知如何研究，甚至连题目都找不到。1982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参与了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的部分筹备工作，并作为发起单位之一的代表前往听会。彼时大陆这一领域的研究刚刚开始，还处于作品批评和资料搜集的最初阶段。对于许多由其他学术领域转入这一研究的人来说，一切从零出发，恰如我当时“一穷二白”的学术状态；而几乎完全陌生的台湾和香港文学，迥异于祖国大陆的文学形态和作品所展示的特殊人生，也激起我极大的兴趣，便不觉卷了进去。最初只是兼及，至 1985 年，在完成了“中国当代新诗史”（与洪子诚合著）的初稿之后，便决心把全部精力转向对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也就现在所说的“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上来。先做台湾文学，继而香港和澳门文学，再是海外华文文学。匆匆三十年过去，才发觉这是我毕生付出精力最多的一件事。“人为写书老，家为出书穷”，在感慨之余也窃幸，我的这一点点学术经历，随着祖国大陆这一学科的发展，不敢说是同步，多少也可作为一点见证。

直到今日，我仍以为，华文文学研究在祖国大陆，还是一个后起的、不成熟的学科，幼稚和青涩，在所难免。然而正是由于它的后起和幼稚，便还有着极大的成长空间，还有许多尚未被我们认识的论题，需要我们去发掘和深入。而华文文学的学科性质，它的跨域的研究，比较的视野，多元文化的冲突和变异，华人的世界性散居和聚合，华族文化的形成和华人性的建构，文化身份和身份文化、华人何以文学和文学如何“华人”，以及多重经验的交复体现，等等，无不是当前全球化体系和本土性建设话题中最敏感、也最具有深远价值的论题。学术的魅力，实质上就是论题的魅力；同样，学术的价值，也来自于论题的价值。华文文学潜隐着许多传统学科所未曾涉及的学术空间和新鲜论题，这是华文文学研究者的幸运。发现和拓展这些空间，认识和深入这些论题，从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充满诱人魅力的华文文学的学术前景，将是可以期待的。

回望自己二十多年来的华文文学研究，我从个案的实证出发，走向史的叙述，个中深感急迫的问题是理论的稀缺和方法的不足。相对于过去常为我们诟言的资料建设的欠缺，这才是滞碍华文文学研究最尖锐的问题。我本不擅理论，在研究中面对诸多新的对象和问题，便也不能不思索它的来龙去脉，复杂关系，努力从实证分析上升到理论层面的诠释，寻求建立能与华文文学这一特殊对象相洽的学术话语和诠释理论。这一切当然只是粗糙的开始，仅表明一种愿望，真正的华文文学学科理论的建立，还有待于更多同道、特别是年轻的学者。为了留下一点敝帚自珍的足迹，这次结集，所选也偏重于概括性和理论性较强的文章，个案的实证性研究就只好暂付阙如了。它本来应有一个更合适的题目：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这是我所有研究的总的追求。在这前后长达二十余年的研究中，随着对研究对象性质的逐步明晰，有些文章的提法或有不同，甚至相左的地方，这里不能一一订正。我想留着它亦好处，我们正是从这样的幼稚和青涩中走来的，犹如一个学步的孩子，从跌倒开始，留一串歪斜的脚印，见证着他的成长。

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

“华文文学”——这样一个整合性的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在一种怎样的思考背景上，被提出来的？相信对于关心华文文学学术发展的研究者，这是一个尚未被充分重视的有价值的问题。

在中国大陆，一般都认为，“华文文学”的正式命名，始于1996年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六届学术研讨会上。这里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国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遭遇，使中国南部濒海的疆域——台湾、香港、澳门，在东西方殖民者的侵占下，处于一种政治上与母土的“碎裂”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大阵营对垒和新中国成立，加深了这些地方与祖国大陆的政治对峙和文化的“盲视”。因此，当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无论世界还是中国大陆政治格局的变化，都使对峙的双方首先从文化上（文学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有一种彼此重新“发现”的喜悦与惊诧。最初是少数有条件接触到香港、台湾文学资料的研究者，“探险”似的进入这一领域。但到1982年于广州暨南大学召开的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标志着这一研究逐渐从零散的个人的学术行为，转化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学科性建设的开始。但很快人们就意识到，最初被作为“台湾作家”研究的诸如聂华苓、于黎华、白先勇等，他们更确切的身份是从台湾移居美国的美籍华人作家；而与此同时，正在复苏的东南亚华文文学，也进入与东

南亚诸国交往密切的广东、福建学者的视野。于是，在1986年于深圳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学术研讨会，便在“台湾香港”（第五届的中山会议增加了澳门）之后，添了一个“暨海外华文文学”，以示研究视野的拓展。然而，“台港澳文学”是中国文学，而“海外”则是别国的文学，二者并置不仅拗口，也引起一些争议。于是，便有了庐山第六届会议以“世界华文文学”的易名。易名本应是对对象的一种重新定位和诠释，然而“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命名，有着这样一个长达十余年的学术背景，重新命名之后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实际上并未脱离原先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框架和轨迹，无论观察与分析的对象、视角或方法，并没有产生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改变。

在海外，对漂离母土的华人及其族裔文学的关注和讨论，从很早就开始。但大都是对于具体作家创作的批评和介绍，还不是我们今日所说的带有整合性意义的“华文文学”研究。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不过我以为，1989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是较早的重要一次。“大同世界”的会议主题，和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在内的会议参与者的广泛性，使它具有了整合性的视野和意图。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华文文学整合性建构的论题，诸如“多元文学中心”、“双重经验书写”等等，对后来华文文学的研究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稍后，美国柏克莱大学的亚裔系，连续两届以“开花结果在海外”为主题，举办了有众多国家和地区作家和研究者参加的华人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虽然如会议主题所标示的，关注的重心是“开花结果在海外”的华人文学书写，但参与者的广泛性和论题的深入是前所未有的。最近的一次在2006年春天，由王德威主导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邀请了来自美国、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家以及留学中国的中国学生，举行了一场人数虽不多但题意深远的“华语语系文学研讨会”，从另外一个视角，与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展开对话。其论题包括中国经验与中国想象在地域、族裔、社会、文化、性别的移动与

转化，华裔子民迁徙经验和典籍跨越，翻译与文化生产，多元跨国的现代经验的世界想象等等，对“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内涵，提出了新的理论阐释。

回顾从国内到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有几点印象值得提出：

（一）华文文学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从对其命名到诠释的游移不定，歧义互见，都说明它尚不成熟。这一点从国内到海外，基本一样。不同的论者，不同的视角，常会有不同的诠释。即使同一论者的前后表述，也常有不一致，甚至相左的地方。这是一个新的学科必然经历却又急需走出的过程。

（二）国内和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存在着认识层面和操作层面上的某些差异。就其对象而言，国内的研究往往把中国大陆的文学摒除在外。这自然有着“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缘自“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而来的学科形成的背景。然而，中国大陆本土文学的“缺席”，不仅使号称“世界”的华文文学研究成为一种“不完全”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在世界华文文学格局中，中国大陆本土文学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华文写作“对话”的缺席。而在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这种“对话”十分重要，是华文文学研究必须具备的条件。王德威在他的“华语语系文学”观念中，就十分强调这种“对话”，他说：在全球化的时代，“华语文学提供了不同华人地区互动对话的场域”，“华语语系文学所呈现的是个变动的网络，充满对话也充满误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无交集，但无论如何，原先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应该因此产生重新思考的必要”。^① 实际上，由“对话”所呈现出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创作的差异，正是它们获得独立生命和价值所在。

（三）国内的研究往往不将华裔的非华文写作包含在内。在国内的学科谱系中，华裔的非华文写作，主要是外文系的学者关注的对

^①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

象，因此，便有了“华文文学”还是“华人文学”的命名之争。尽管这种现象在近年来已有所改变，但它仍然说明，国内的华文文学研究，是以华文书写为界定的。其关注的中心，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传统，在文学书写中的回归与变异。而华裔的非华文书写，其核心不在语言而在创作主体的族性，更多关注的是华人族属身份所包容的文化，在异文化土壤中的隔代生存与变化，以及如何将华族的文化身份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源，从而在所居国多元文化的网络中构建华族的文化地位。

（四）无论国内还是海外，文化都是华文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重心，只不过其侧重面各有不同。中国大陆的学者最初更多的是关心海外华文书写的中华文化遗产，对中华文化在异文化时空环境中的融合与变化，是近年才逐步得到重视的主题。而海外“新移民”作家，如其主要的理论发言人陈瑞琳所表述的，是在生命的“移植”中对母体文化的“放弃”和“寻找”，在摆脱“家国文化”的心理重负中，“重新审视和清算自己与生俱来文化母体，从而在新的层面上进行中西文化的对话”^①。而在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观念里，是在中文书写的越界和回归中，作为一个辩证的起点，探讨“中文书写如何承载历史中本土或域外书写或经验，多元跨国的现代经验如何在歧异的语言环境中想像中国——华人——历史”^②。简言之，中国大陆学者更多注意的是文化遗产与变异中的异中之“同”，而海外学者的观察，更多的是集中在文化延播与变异中的同中之“异”。

（五）方法论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华文文学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比较文学方法的引入。最先将这一研究方法引入华文文学研究，同时

① 陈瑞琳：《“迷失”和“突围”——论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化“移植”》，载《思想文综》第10辑第236页，饶芑子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

②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

将华文文学导入比较文学研究范畴的，是兼有着文艺学和比较文学学术背景的饶芃子教授。她的不遗余力的倡导，使华文文学研究者在视野的不断扩大中，借鉴比较文学的方法获益良多。随着年轻一代学者的不断加入，受到关注的方法论问题对华文文学研究学术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华文文学研究的某些认识上的不同，是一种客观存在。有人建议将这种认识差异称为“中国学派”。我想“派”则不必，因为中国大陆学者的认识并不一致，也在变化之中，这是一个有待丰富和完善的学科，称“派”为时尚早。但是，差异是对对象不同侧面和层面的认识，差异可能是一种“片面”，但却由此产生互补的需要，提供对话的空间，从而使对对象的认识立体化起来。

华文文学是一种“离散”的文学。这里所说的“离散”，是指华文文学散落在世界不同空间的存在状态。它根源于华人离开母土的世界性迁徙和生存，这是华文文学重要的发生学基础。

二

有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需要深入辨析。我们常说，华文文学是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等相同的一种语系文学。这是就语言的世界性存在现象而言。然而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这种语言的世界性存在有两种情况，在诸如英语文学、法语文学等这些在“语言宗主国”之外，“世界其他地区以宗主国语言写作的文学……带有强烈的殖民和后殖民辩证色彩，都反映了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占据某一海外地区后，所形成的语言霸权及后果。因为外来势力的强力介入，这些地区的文化必然产生绝大的变动，而语言以及语言的精粹表现——文学——的高下异位，往往是最明显的表征。多少年后，即使殖民势力撤退，这些地区所承受的宗主国语言影响已经根深蒂固。由此产生的文学成为异国文

化的遗蜕。”^① 华文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流播与存在，不是“殖民宗主国”的“文化遗蜕”，其性质与此完全不同。

华文是伴随着 19 世纪以来华人的海外迁徙，而大量播散世界的。其时中国正面临着世界殖民主义的侵扰，迫于生计而无奈谋生异邦的华人，无论是在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是到同样处于殖民压迫下的欠发达国家，都是弱势族群，华文在华人所居国的语言和环境里，也都是弱势语言和弱势文化。即使由于华人的刻苦奋斗，在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甚至在某些国家，华人经济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强势经济，但仍无法改变华人在所居国中语言和文化的弱势地位。这一状况无论在华人政治、经济都处于弱势的欧美诸国，或者在经济略居强势的某些东南亚国家，都是一样的。华文首先是作为移居海外的华人族群保留母语的一种生存方式而存在的；其次才通过华人的文学书写，成为他们铭刻自己几近衰亡的族群记忆，再现从国内到海外的双重生存经验而获得精粹体现的。华人的华文书写，是一种母语书写，而其他受到西方殖民的国家对宗主国语言的书写，则是一种被迫的非母语的书写。即使在殖民势力溃退之后，依然无法摆脱这一后殖民的文化遗蜕。前者是伴随移民的语言移入，是移民主体对于母语的语言行为，在所居国的语言环境中，是一种弱势语言；后者则是伴随殖民而来的语言“殖民”，是殖民者强加于被殖民者的语言霸权。二者有着性质上的根本不同。

华人在海外的生存，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再到华裔的身份变化^②。华人身份的每一变化，同时也反映在华文文学与其文化母体的错综文化关系之中。20 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海外移民，保留着“双重国籍”的政治认同，不论其是否加入移居国国籍，也不论其数代不

①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 年第 5 期。

② 刘登翰、刘小新：《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范式的转移》，载《东南学术》2004 年第 6 期。

归，都被视为中华子民，即为华侨。此时他们的文学书写，是一种华侨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海外支脉，其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是一致的。20 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政府取消了“双重国籍”的政治认同，海外华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大多选择加入所居国国籍，他们的身份由华侨变为海外华人，成为所居国多民族构成的一个成分——华族。在政治认同的国籍改变之后，在文化认同上却无法完全改变，实际上存在着华人对自己母体文化与对所居国本土文化的双重认同，或者不同程度地在自己族裔文化基础上融吸所居国的本土文化，从而形成了具有所居国文化特色的华族文化。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不完全一致，是这一阶段华族文化的特点。而到他们数代之后的华裔，已经融入在所居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已趋于一致。在许多情况下，缘自他们父祖而来的无法改变的族裔文化身份，正逐渐变为一种身份文化，成为他们参与所居国多元文化建构的一种资源。无论他们用华文写作或非华文写作，他们是透过自己已经认同的所居国文化，来重新辨识和书写自身的华族文化——尽管这种“辨识”和“书写”，充满了误读和重构，却成为华裔文学书写普遍性的特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海外移民，成为散居于世界不同政治空间中各自独立存在的中华族裔，而反映他们生存经验的文学书写，却难以完全割断母体文化的精神脉络，在双重文化的认同、融吸和重构中，既相联系又各自独立地呈现为所居国少数族裔（华族）的文学存在。华文文学客观的这种“散存”状态，是我们观察和思考并重新进行对话、比较和整合的无可回避的事实。

三

然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一种整合性的视野，是面对“离散”的一种想象的整合建构。

其实，所有后设的文学概念，都是一种想象的建构。从本质上说，文学书写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每个作家都根据他独特的人生经

历和审美体验，进行个人化的创造。但每个作家的个人化创造，同时又被纳入一个系统之中，不但他生活在这个社会文化的网络系统之中，从书写的语言方式，到感受的情感结构和传达的文学形态，都不能不受到这一文化网络的制约，从而使个人化的写作深烙着这一群体性的文化印记。正是作家个人化的文学书写，同时成为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才使文学研究更为普适性的想象的建构成为可能。

国家的或者区域的文学史书写，是在政治疆域的边界之内，对文学发展进行跨时间的建构。这种建构虽然有着历史书写者各自的性格和特征，但总的说来，他并不能摆脱家国叙事的背景，或者竟就是家国叙事的一个部分，一个侧面。

然而华文文学，是超越政治空间的想象，它打破疆域，是一种超地理和超时空的整合性的想象。

中国的海外移民，使华人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散居”的族群。事实上，并非每个移居到世界任何地方的华人，都“单个”地生活着，不管他愿意或不愿意，他都生活在、或被视为生活在某个族裔的网络之中。他的肤色，他的语言，以及他的文化——从心理到行为，是一种无形的纽带，将他们“归纳”在一起；更何况还有一个有形的“唐人街”，成为他们族裔和文化存在的象征。海外华人的“散居”，实际上是一种“离散的聚合”。“离散”是相对于他们的母土，而“聚合”则是相对于他们在海外的生存方式。中华文化随着移民的携带而传播世界，也成为一种“散存”的形态。“散”是指其流播，而“存”，则是一种文化延续的存在状态。海外华人是通过自己一系列的文化行为，从华文教育、华文报刊到华人社团等等，不断地实现这种族裔和文化的整合，以保存和抵御异文化环境对自己族群和文化的压迫与侵蚀。在这个意义上，华文文学书写也成为一种文化政治行为，是华人对自己族裔的历史记忆与生存状态的铭刻与建构。在这种记录自己独特生存历史与经验的文学书写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不仅有了自己迥异于母体的独特的性格与色彩，也有了自己自立于母体的文化与文学的价值与生命。

华文文学这一跨域建构的概念提出，包含着一个理想，那就是1989年在新加坡会议上所提出的“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因为它是“华文”的（或华人的），便有着共同的文化脉络与渊源；又因为它是“跨域”的，便凝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人生存的历史与经验，凝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华文书写的美学特征和创造。它们之间共同拥有的语言、文化背景和属于各自不同的经验和生命，成为一个可以比对的差异的空间。有差异便有对话，而对话将使我们更深刻地认清自己，不仅是自己的特殊性，还有彼此的共同性。华文文学的跨域建构。就是在共同语言、文化的背景上肯定差异和变化的建构，多元的建构。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创造，既是“他自己”，但也是“我们大家”。这就是我们所指认的“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原载《文艺报》2007年12月13日，

原题《华文文学：跨域的建构》）

目 录

自序 1

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1

第一辑

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 3

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 13

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 29

世界华文文学的存在形态与运动方式

——关于“一体化”和“多中心”的辨析 48

对象·理论·学术平台

——关于华文文学研究“学科升级”的思考 59

第二辑

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

——《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引论 73

美华文学的历史开篇

——重读《苦社会》 93

精神漂泊与文化寻根

——菲华诗歌阅读札记 110

论《过番歌》的版本、流传及文化意蕴 126

追寻中国海外移民的民间记忆

——关于“过番歌”的研究 139

第三辑

分流与整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 157

台港澳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

——再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 173

台湾文学：分合下的曲折与辉煌

——《台湾文学史》总论 185

特殊心态的呈示和文学经验的互补

——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看台湾文学 239

中国新诗的“现代”潮流

——兼论台湾现代诗在中国新诗发展上的意义 255

香港文学：历史交错的绚丽画卷

——《香港文学史》导论 272

香港文学的文化身份

——关于香港文学的本土性、中国性和世界性 307

香港新诗发展的历史脉迹 321

文化视野中的澳门及其文学

——《澳门文学概观》绪论 336

刘登翰学术年表 - 368

第一辑